

今日評論

第三卷 第十二期

目錄

豫南鄂北大捷(曲)

德僑荷比處(穆)

英閩改組(端)

今後的外交

所謂教師的思想問題

評定價格的原則

患土地饑饉者

生活

錢端升

潘光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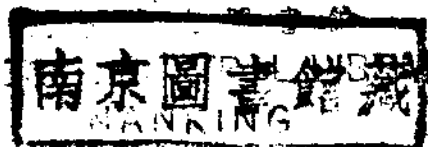
伍啓元

費孝通

木風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豫南鄂北大捷

這一次敵軍在豫南鄂北的蠢動，是敵人夢逐西寧南陽，襄陽兩重要據點，以爲北窺陝，南竄島韓根據地的第二次嘗試。第一次是在去年春天。第一次的嘗試是大大的失敗。去春隨襄之役是合見莊之後我們一個大勝仗。隨襄戰役之後，敵人雖然仍然佔了信陽，隨縣，鐘祥等地，而軍事方面，在這整整一年中，可以說是相當的沉寂。

這一次敵人西攻的計劃是在五月一日開始。就兵力部署略上說，這一次進攻的規模都比上一次大兩倍。上一次敵人的兵力約三師團，外加騎兵一旅團。此次敵人的兵力爲四師團半。上一次敵人進攻的方法是側重於隨襄正面，以小包圍的戰術，實行其突破我主力的企圖。這一次是採三方面並進的辦法，採用所謂「包抄」，「合圍」，「殲滅」的戰術。北路由信陽，明港以攻唐河，桐柏爲其右翼，中路由隨縣西攻棗陽爲其正面之主力，南路由鍾祥沿襄河北進以趨樊城爲其左翼。唐河，桐柏，新野，棗陽，相繼爲敵軍所佔，然而敵人包圍我主力的企圖完全失敗。我軍以機動的戰術反而抄包敵人各翼的後方，而造成一反包圍的形勢，將敵軍節節截斷，個別與以聚殲。敵全線大亂，東南潰竄，前失諸城和糧克復。總計敵人此役兵力損失不在三分之一以下，西攻的計劃，在短短的十日內，已算粉碎無遺。

本年以來，敵人主力進攻之第一着爲桂中，第二着爲臨河五原。這兩着都經我軍的痛擊而一無進展。於是乃轉其方向而注意於豫南鄂北。豫南鄂北又失敗了。其榜徨失措的情況可想而知。然而戰局既然是欲罷不能，則唯一的辦法便是再轉移他們的方向，作再度的掙扎，而粵漢路與桂中都是可能的新衝突區域。然就歷次的經驗來看，敵人的戰鬥力已是愈戰愈弱，而我軍的士氣，戰略，無不愈戰愈強。我們相信敵人儘管屢變其進攻的方向，他們絕

沒有得逞的機會。(由)

德侵荷比盧

自從凡爾賽和約成立後，德國人民總是抗議和約中判德爲大戰的禍首的條文，國社黨執政之後抗議尤力。我們看了歷年來國社黨政府的暴動蠻幹，以及多數人民贊助它的這種行徑的情緒，深覺窮兵黷武者也就是怙惡不悛者。

赤裸裸地侵略慎守中立的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絲毫沒有顧忌，連蘇台德及丹澤的藉口也不存在，連英海軍置水雷以加強封鎖的藉口也不存在；這種行爲，東亞只有暴日，歐洲只有暴德，強暴不打倒，天下無寧日矣。

德國要於今年五月一日起，採取宏大攻勢，德人本宣傳已久。國際局勢觀察者則對之將信將疑。德人宣傳他們有新武器可於五月一日前完成，故五月一日起可以採取攻勢。這種宣傳今已成了事實。德人進攻的方式是侵略小中立國，德人利用的新工具是降落傘部隊。幸而小國們早已提防，而英法赴援的計劃亦早劃定。所以德軍一開始發動，荷比英法的軍隊即起而迎擊。德軍於十日拂曉進攻荷比盧。雖即起先的三三天頗顯劇烈的來勢，但到了今日則已入呆頓狀態。換句話說，德人閃電式的戰術，此次施之於低地國家並未成功。

在軍事上，德人這次的行動當然使「假戰」變成了真戰，此後數月內戰勢將熱鬧萬分。但兩方既勢均力敵，勝負仍恐難於數月內決定。大戰數月而後，兩方或仍須休息一下，另想致勝的辦法。

如果上述的觀察不錯的話，義大利的參戰仍須有待。

在國際上，德人的攻勢使英人不得不作進一步的努力，於是內閣加以改組了。多年來締視希特勒的行動最嚴密的邱吉爾繼起。瑞士現已動員了，美國止維持着一種充滿緊張的緘默。歐戰的緊張化增加了羅斯福繼任的可能性

。羅斯福對國社主義厭惡算是深入骨髓。美國人 國社主義的真面目多一分
 瞭解，則羅斯福亦必多獲一分領導的力量。美國重演一九一七年二月絕交四
 月宜戰的舊戲或許也不在遠。

然則希特勒亡命式的衝鋒，或者就是他自身的催命符罷！(都)

英閣改組

一月來的擄戰，本刊上則短評會加論列。張伯倫初於五月
 二日對下院有所說明，繼則於七日續有所申述。議員中雖
 有不滿之聲，但八日休會決議(十二日耶穌節英國例休會若干日)，政府
 仍得以二八一票對二〇〇票的多數勉強通過。大家方以為閣潮或可暫時不起
 。

但是英國國會內外，對於擄戰的失利雖可原諒，而對於張伯倫內閣與敵
 的能力總不放心。國內頗望反對工黨及自由黨入閣，而此二黨又不願參入張
 伯倫的內閣。於是九日晚即有改組醞釀，張伯倫亦有讓賢表示。十日拂曉，
 德使荷比處，於是改組的要求更有急轉直下之勢。結果，由邱吉爾組戰時內
 閣，除首相外，僅有張伯倫(保守黨)，哈立法克斯(保守黨)，阿特里(工
 黨)，格林伍德(工黨)五人。此五人中除邱吉爾兼國防大臣，哈立法克
 斯兼外相外，其餘均無實職。此外又任工黨亞歷山大·保守黨艾登，自由黨

今後的外交

我國外交向不易辦，抗戰軍興以來尤甚，而歐戰爆發以來更甚。現在歐
 戰規模日見擴大，不但我國經濟受着不利影響，而外交的困難也是較前增加
 。所以我們此時務須對外交方策重新檢討，對外交工作重新整理，而對外交
 機構尤須加以重大的調整。

先論機構的調整。機構不調整，方策無由決定，已決定後則亦無由規正
 。機構不調整，工作無由計劃，既計劃後亦無由執行。

近年中樞實無外交機構之可言。外交部固常設，但不能決定外交方針，

李克農分別為海陸空各部之部長，名義上雖不在戰時內閣之內，實際當然也
 得參加大計。

此次改組，向日以擁護安協聞名的賀爾，西門，或黜或貶，而向日反對
 安協政策者則無論保守與反對，皆遷垂青。如艾登則為陸長，如杜夫柯柏則
 為宣傳部長，如阿茂里則為印度部長。這些為保守黨人，其餘工黨及自由黨
 人更無論。這樣一個新閣，當然可以一新天下耳目，何況邱吉爾本人原是多
 年來反希特勒的健將。

尤可令我們欣慰者，即英閣改組雖在國難最嚴重的關頭，而偏能於最艱
 利平穩的空氣中完成。即張伯倫亦樂於追隨邱吉爾之後，共為國家努力，誠
 如李斯密斯教授十三晚在下院所說，畢竟民治國家有旁的國家所不能望及
 項背的美德。自此而後，英國之勝強權可操左券。

同時，我們也應知道，政府如有改組必要，嚴重的局勢不特不是不稱職
 當政者的護身符，而正是改組的理由。英國一九一六年的內閣改組，才產生
 了一九一八年的勝利；今次的改組也就是以得到勝利為目標。我們於此正應
 師法！(端)

錢端升

縱然決定了外交方針，也未必由外交部指揮執行，外來的情報亦未必盡經過
 外交部。如謂外交部是一個喪失了能與覺的機體，也不為過言。外交部長官
 也未嘗不知此種情形。但中國官場本具有一種奇妙的對抗力——或者可說是
 不對抗力——所以無權的官也總有人做，而且這種官還可以久在與求無過，
 不求有責的心理中逍遙着。

外交部而外，行政院副院長以及未兼院長時代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當然也有權過問外交政策。這本是正當的。任何國家的內閣總理，如不兼任

外長，也有權過問外交。但所不同的是：張伯倫雖斯福雖不斷地過問外交，但外交行政仍在外交手中，他們也決不將外交部長撤開而直接行事；而在我國，則操大權者直接行事的事例，過去不可勝舉，這實在足以紊亂外交的系統，且足使外交部喪失其機能。

行政院正副院長及軍事委員長而外，國防最高委員會（舊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及隸屬於行使職權却未廢除的政治委員會的外交專門委員會，也有權參預外交大計。在理論上，國防最高委員會為外交政策的最高決定機關，而外交專門委員會則受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委託，審議外交政策及其他外交事件。實際上，外交專門委員會的人選，過於輕微而且複雜，不能負此重任，而該委員會為主任委員的外交部部長，常以冷淡的態度應付之，甚至不召集會議，故外交專門委員會等於虛設。至於國防最高委員會，則因外交部部長，行政院正副院長，以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俱為主要委員之故，對外交事件，也不過將他們若干要人間的已經過手的事件重複討論一遍而已；有時以過分重要之故，而不提出討論。所以從實際上講，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外交專門委員會，並未破壞外交機構應有的整齊劃一。

由於以上的情形，可見外交機構雖十分複雜，而不能担当大任，但改善却也不難。處現狀下，先決問題就是任命一肯負責，有能力，熟悉外交情形，且能得信任的大員為外交部部長，而授之以全權，一切行政則集中於外交部，而蔣院長則居於指導監督的地位。如果現任外交部部長是這樣的一個人，即應授以全權；如果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即應另覓妥人。行政院副院長應令其除在行政院會議席上外，不問外交之事，以清事權，以專責任。外交專門委員會可依舊不開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可依舊少問外交之事，即有討論，亦不應更動蔣院長與外交部已定的政策。

外交部既有了外交大權後，便可負起責任，對外交事項作應有的發展。較小的及較無問題的，外交部可相機處理，不必有待於會議或請示。外交情報，外交部可以集中蒐輯，所報告於院長者應限於精華，而不應是渣滓。

蔣先生無論以全國人民所共戴的領袖資格，或以最高統帥的資格，或以行政院院長的資格，必須明瞭國際情勢的變化及我國對外所取的步驟。但為節省蔣先生的時間精力計，政府應有一個專一的機關可供給情報於他。這個機關就應是外交部。如果外交部不能供給，而有待另設機關或另行徵集，則實太枉費了蔣先生的時間及精力。原來，情報是愈多愈好，意見亦愈多，而抉擇之機會亦愈多。但外交部應負責多方搜集，應負責加以整理，然後再陳之於上。世上善搜外交情報者，實在莫過於英國外交部。英國首相自 Chamberlain 以來，亦未有不注意外交情報者。但如英國首相不重視其外部所得的報告，不重視外部高級人員所提的建議，而自行旁搜博採，且所獲者，不免矛盾衝突之處，則他又烏能有餘暇以盡力於大計的決定？所以無論從蔣先生方面講，或從國家的立場講，達到最高領袖的耳目之情報及意見，應來自一個負責機關，而不應來自多個不負責的機關或私人。如果外交部不配做這個機關，這恐怕是外交部人員之過，而非外交部機關之過。我們此時應改委外交部的人員，而不應於外交部之外添上許多龐雜的機關或組織。如果特務秘書之流，俱由毫無經驗者充任，而可在國土之外，妄自干與關係國家存亡的大計，則於國家誠是莫大的危險。

也許有人要說，適當外長難覓，所以不得不於外交部之外，另加補救辦法。多年來我們的外交部部長，論其施展，不特不及獨立自主的赫爾及哈立法克斯，且不及希特勒手上的里本托甫甚或連莫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也不如。這決不說國內連里本托甫，齊亞諾，有田，這樣的人材也不有，而是說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太沒有權。如果如此，則充實外長權力，實是覺得外長的必要條件。

所以改善外交機構第一件，要是以外交部為唯一外交行政機關，且須以負責有為之士充任部長。

外交部復權以後，使節方面亦應加以充實。使節中何人勝任，評判的客觀條件不是沒有的。大致說起來，其人與駐在國朝野能交接，能為其所敬仰

，而所注意之處在如何能利用駐在國可能的力量以支持我抗戰局面者，便是稱職盡責的使節。這些事外交部當然應該知道，事實上也不難知道。如果外交部依然充耳不聞，掩目不視，而反派遣所謂觀察員者，率着作環球的週遊，甚或憑勢安插其兒輩於一二領館，則直是掩耳盜鈴而已，我們誠不知其可也。

外交人員的養成也是一件急務。我國最早外交人員多取自方言館譯學館，及後聖約翰輪機之而起，再以後則援用子弟親戚之風起，於是外交人員實氣兩下。國民政府成立，對外交人員的培養從未注意，而由亂放亂派調而得者則數不在少。長此以往，外交人員中不特有識有學之人不可得，就連國人向來所看不起的能講洋話能懂洋禮的外交家也將不多。是以外交人員的培養也是當前急務之一。而改善後的外交部務應以全力赴之者。

但要使領館能發揮正常效用，要使有志有學青年願服務使領館，則增加使領官的薪給也屬必要。現在使領館的薪給足以使貪懶者富，而決不敷勤廉者正當的費用。際此國家財政困難之際，兩全之道惟有裁汰冗館並裁汰非館中的冗員，而以所節省所得，補不裁之館與不裁之員。

次論外交的方針。

抗戰建國綱領中關於外交的規定，目標十分正大，自然應為我外交的基本政策。但綱領中所云僅是綱領，具體辦法尙有待於釐定。

我以為在抗戰現階段上，我們無論對內對外，對人民，對自己，皆應堅信抗戰的勝利必須賴自力；因為必定有此信念，然後可以經歷國際間任何變化而不自餒。友邦助我，我自歡慰感激；友邦助力不至，我亦無須失望，更無須詛咒。我們與各友邦之間，尤其我們與各反侵略國家之間，須發生真正的同情。真正的同情更易引誘助力之來臨。我們試問心自問，有時心中發出的怨恨或疑慮，此怨恨或疑慮是否由自力抗戰的信念太薄弱所致？

其實，有了自力抗戰的信念後，我對各友邦的方針便不難決定。

對美國，我們應但謀增進友誼，而不作高度的求援。美國有實力，亦為各交戰國（歐亞二戰）所畏，但十餘年來因鑒於上次參戰的結果，只落得一個道德破產，理想破產，經濟破產，和平生產的世界，所以對戰爭最厭惡，亦最看破；孤立主義不特為若干政客所誠意擁護，與若干其他政客所引為取好民衆的工具，且這種主義深入於大多數民衆的心坎，而成爲國策。由此以觀，這國策是有心理上的基礎的。我們如缺乏同情的理解，而只視這國策爲懦怯的表現，或爲顧全私利的表現，甚或詆它爲資本主義的末落，則是距離萬里，永遠不能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就永遠不能與美國發生友好的關係。我們應曉得美國人民並不因孤立而減其對獨裁武者的痛心疾首，亦並不忽視打擊這些獨裁武者的必要。特美國人頗多以為：如果美國不參戰而獨裁武者即失敗，則美國可避其清醒冷靜的頭腦，佐以未受損失的國力，來勸導世界各國進入於較合理的國際秩序。如果非美國參戰不能摧毀獨裁武者的勢力，則美國勢須參戰。美國人固然也有先知後知，先覺後覺之分，但對於摧殘獨裁武者的勢力的必要，則大多數美人決不會不知不覺。美國現在正在先知後知，先覺後覺的過程中邁進，丹挪荷比盧諸國的被侵正在使邁進加速，我們對於美國的將來不應懷疑，對於美國可爲被侵略國聲援之處更不應懷疑。我們此時一方應使美國相信我們對抗戰有最大的決心，對民主及和平有最大的信仰，一方更應避免希望甚或勞動美國參戰的嫌疑。我們可使美國明瞭我方的困難，但不可稍存一爾應助我作戰之心。所以借款我們可懇求，但關於美國海軍的行動等，我們決不可直接有所表示。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對美國參戰的可能應該熱無睹。美國於七八個月內或會參加歐戰。美國參加歐戰時，我們務須使二戰合而爲一，使美國也成我們的同盟國。美國的軍事行動不能令之只向歐洲，而不向遠東。如何使美國的軍力可在遠東發揮，我們軍事當局此際即應作未雨綢繆。

對英法，我們也應採極端同情的態度。他們現在正作殊死戰。他們的每一注意點，即在如何防止德國侵略的成功，並進而擊敗之。如果聯日而可以

助他們達到目的，他們當然願與日。我們單單責備他們有妥協的傾向是無補於事的。我們所急應為者，即如何可以使他們曉得與日妥協少可能，而更急者，即如何可以使他們明瞭妥協（即使成功的話）不但無用，且有害處。我們如加緊抗日，使日除全力應付我們外無餘力，則妥協當然無用。我們如能使美國完全同情於我，且十二分畏懼勝利的日本，則英法如與日的妥協，當然可以使美國疏遠英法，因之對於英法有害處。

換言之，我們對英法，除要求其維持舊有的情誼及給予我的方便外，此時不必再有進一步的企求。我們也不必懷疑他們，埋怨他們；我們應求諸在己，使他們瞭然於與日妥協之有害而無益。

對於蘇聯，我們應深深感謝也過去對我的同情及援助。在蘇聯沒有參加德方作戰以前，他仍將繼續為我的益友。如果他永不參加德方作戰，則他始終將為我的益友。這種基本要點，國人是應明瞭的，所以我們此時應可作推測的功夫，而多做減低英法美與蘇聯間形勢對峙及感情惡化的工作。我們現在已不是一個國際間不足重輕的份子了。我們如整飭我們的紀綱，統一我們的陣線，並起用如加富爾一類有遠見，有魄力的人辦外交，我們應能記一八五六年的比德蒙，其實力尚不及今日的中日，徒因加富爾能善用國際局勢，遂使英法樂於交好而義大利能統一能併於強國之林。有為者，亦若是。加富爾可以成功。我國豈無加富爾其人？

義大利在國際現勢中是一輕重不著之國，對我更鮮重輕，可以不論。

德國是同日不一樣的魔獸。我們既與戰勝日本，為世界人類除一惡，我們也應望英法勝德，為世界人類除另一惡。善惡之間，其取舍不容遲疑，我們不應敷衍。

機務既改善，方策既肯定，應論到外交的工作。

外交部與使節應做的第一件工作——也是最基礎的工作——是收集準確的消息情報，細密的觀察國際局勢的變動，並予以不誇張的合理解釋。這項工作，英國向來做得最完滿。但數年來，英國對希特勒軍的情報搜得不充分

；既搜得而後，張伯倫等又不肯予以有眼光的解釋，遂致釀成今日的大患。我國外交部及使館對情報及其解釋向來馬馬虎虎。近年稍知注意，則偏偏又出了許多妄人，專以說些深中當局脾胃的話為能事，或危言聳聽，或天花亂墜，其結果往往可笑。然而可笑還是小事，而誤國則是大事。為今之計，對使節及搜集情報之人，應注重（一）對國際時勢有史的基礎，（二）有虛心客觀的態度，並（三）具正常的腦筋。外部本身，更須有一組織，使各方的情報可以由少聚而為多，由缺漏進而為完密，由紊亂整理而為有條。經此整頓之後，蔣先生應依靠正常的外交官署及人員，以取得情報。像從前的情形，則實在說不到辦外交也。

第二件工作是宣傳。吐出的重要正如吸收一樣但必須含英咀華後能吐華。我們過去的國際宣傳也可說是瞎來的。在中央，此辦宣傳，彼亦辦宣傳。在國外，甲宣傳這樣，乙宣傳那樣。使館長官本應統理所在國的宣傳，但或則對國內派來的宣傳員極不接頭，或則自己也專作無思無慮的亂說。其中固然也儘有例外，但是魚目既可混珠，此輩例外往往反為羣草所壓蓋。最無聊者，不但在國外少能宣傳，向國內還要大宣傳其宣傳力之大。這真令有識者見之哭笑皆非。為今之計，在中央應統一宣傳組織，委一班有識之士，總管對外宣傳；在國外更應慎選使節，令大使公使總管駐在國的宣傳，無益的宣傳應一概停止，有害的宣傳更須停止；但我方抗戰的實況則須以最靈敏的方法，最誠實的態度，宣達於外。打了敗仗也不必諱言。我們第一要人家相信。有了信，然後他們知道了我們抗戰的努力會起敬，知道了我們的困難會願於援助。我們毋須隱瞞我們的弱點。我們的弱點人家那有不知道？此次參戰會中，因大家欲顧全孔兼財長的感情及體面，明知孔令愷犯了種種幼稚狂妄病，而質問時未顯掛及其姓名。但美國的一時閱一週刊，則早已將孔的事蹟登載。此可為一例也。

第三件是做各種政治牽掣工作，使日本在英法美蘇中拉不着朋友，使英法美蘇無一顧與或敢與日本接近。我們應得日本常向美國送秋波，英法對

日的意志有時太不堅決，所以獲得準確的情報而後，不能不想出辦法來，加以個別的確據，或綜合的抵制。要做這些工作，我們的使領官應全體動員，全體協作。如果荷屬印度我國領事得一關於日本海軍野心的確實密報，則這密報在我國駐美大使手中，便可成一種有力外交武器。如果英國保守黨局有與日妥協的勾當，則這個消息一落入英國反對工黨或自由黨的領袖手中，亦可驅使我駐英大使的多次陳說，多次抗議。如各行其是，外交毫無統籌之力，則充其量亦不過是一二大使特別有名而已。

做政治牽掣工作的時候，我們當然要努力使各友邦對逆德偏袒組織取最卑劣最不合作的態度。

第四件工作是求助的具體工作。此中可得而言者，第一是美國的借款，第二是美國的購銀，第三是英法對於西南新鐵路的墊資，第四是英法東亞殖

所謂教師的思想問題

潘光旦

五月十二日與十三日中央日報的「每週專論」欄裏登載着潘公展先生的一篇「教育上兩個迫切問題」，一是教師思想問題，二是青年營養問題。關於前一個問題，公展先生說：「須知今日的青年思想的歧誤，與其說是青年思想問題，不如說是教師思想問題。我敢說，教師思想如果一致，如果純正，學生思想是決無駁雜的問題的。」這是一番何等嚴重的話。作者置身大學環境且二十年，所見和公展先生的很有不同，又忝為教師的一人，責任有歸，未敢緘默。

公展先生所說的教師雖沒有指明那一級的教師，作者以為大概是大學的教師。不過依作者的見解，大學教師的思想似乎不成問題，因為大學教育裏根本就不多談思想，多談思想的還是大學範圍以外的文化界的人士，包括政治界在內。這豈不是說大學的教師根本不談思想，談的自然也大有人在，不過他們大體了無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他們主要的任務是教授自然科學，

民政地政府對於西南運輸的合作，第五是蘇聯對於飛機及汽油的供給，第六是向各友邦請求軍火及汽油的接濟。以上六項中，前五項已在進行中，雖然困難頗多；第六項則未有進行。苟我們能努力抗戰，更能改善外交機構，則此後進行，當可較易。

現在國際形勢在劇變中，美國態度的急進恐不在遠。在未變前，我們請求的具體援助應只限於前述數項，增多反生枝節。但變後，則我們立須請求其他的助力，甚至如海軍調動等事。美態度既變，英法對遠東的態度也必較趨於積極，故對英法我們也須準備提出新的請求。

我們對我們的外交亟須有一綜合的看法，綜合的改善，綜合的推進。從前政府所提的改善調整，如外交部之由五司變為七司，或如外交部向中全會及參政會所提報告云云，皆是敷衍塞責，不足以言外交也。

社會哲學，人文科學的種種課程。這也並不是說課程的內容裏根本沒有思想的成分，課程裏講思想方法的很多，講思想所根據的事實的更多，講思想的演變，派別，與所引起的問題的也不少。約言之，大學教育裏沒有專門灌注思想的教師與課程；教師與課程只供給思想的方法，思想的資料，思想的歷史與家數，至於學生在學成之後究竟服膺那一派或幾派的思想，甚至於加上一番發明綜合的功夫之後，自成一派或幾派，那是學生自己選擇與努力的結果，與教師和課程很不相干了。教師既不灌輸思想，試問公展先生所暗示的青年思想歧誤的責任問題將從何說起？

不過我們也知道，公展先生也會明白的指出，他所說的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三民主義一類的思想。也好，我們不妨再進一步的對大學教師和三民主義的關係觀察一下。我們有頭就可以坦白的承認這關係並不密切，遠不及公展先生所期望的密切。不過，這怕是事實上無可避免的。在講授自然

科學的教師各有各的專科學問，教學之外，還須從事研究，此外要對本行以外的社會思想與學說作深切的探討，興趣不論外，時間也確乎不許可。不過他們也很可以說，他們的專科學問也並不是和社會思想全無關係，即就三民主義而言，民生主義背後有地質學、化學、物理學，以至於生物學，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背後至少都有生物學；他們的潛心研究與教學直接所以為三民主義補充事實的根據，而間接對於民族的發展，民權的擴充，民生的利濟，遲早也會有實際的貢獻，他們甚至於可以說，到目前為止，誰都不敢承認有那一派的社會思想，學說，主義已經到達一個盡善盡美的最高境界，而無待乎修正補充；修正補充是要事實與經驗的，而一部分的事實與經驗必須求諸於自然科學的統域；然則他們目前的真正的本分，是在多做些腳踏實地的試驗室與廠屋的工作，而決不在高談闊論任何一種的社會理論。作者以為這種見地是對的。所以就理工一部分的大學教師說，他們對於三民主義一類的思想，雖不能有功，也絕對不能說有過。公展先生所暗示的責任問題，至少對這一部分的大學教師是不適用的。

至於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範圍以內的大學教師和一般社會思想以及三民主義的關係，比起自然科學的教師來，要密切得多了，但也還不如公展先生所期望的那般密切，而且所謂密切的性質也許也和公展先生所想像的不一。他們的確和三民主義，至少和三民主義的思想的內容，時常發生接觸，尤其是社會科學的教師。信仰三民主義的人也承認三民主義是近代思潮的一部分，固是有它的來歷的；民族主義相當於近代思潮裏的Nationalism，民權主義相當於Democracy，而民生主義則相當Socialism，三者經歷過程中由先生的一番修正與補充之後，終於成爲一派胡漢堂先生所認爲有連環性的綜合思想。在講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對於這三部分的思想是最熟悉不過的，也是非熟悉不可的；教政治學的教師對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自然特別的研究過，教經濟學的對民生主義也是一樣。至於教社會思想史的社會學教師更是實無旁貸的必須把三部分認識一個清楚。他們講到這三部分思潮的衍變與發展時

，會把中山先生一番修訂的苦心地沒了！當然不會。所以這想議論，這一部分大學教師和三民主義的關係，事實上絕對的不能說不密切。不過就研究與教學的方法與態度說，這方法與態度，我們不妨坦白的說，便決不是一般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所有的或所期望於它人的了。第一，不講現代思潮則已，講則不能限於一派，不講某一派的思想則已，講則不能不把一派的家數與變遷充分的說到。第二，學派與家數的價值雖不一樣，却沒一派或一家是至善而無懈可擊的，所以教師講解的時候，只能取一個介紹與評論的態度，而不能用宣傳與灌輸的方法；即或一個教師對某派某家表示更大的同情，而私衷學學服膺，他還是應當力持客觀的態度，庶幾不至於在學生的心坎上，留下一個偏見的印象。三民主義既屬現代思潮的一部分，其內容與實質無疑的是在介紹與評論之列。也是無疑的，這種評論是根據客觀的原則的，而說作者所知，也沒有不是善意的而富有建設性的。這班教師也未嘗不深知三民主義是主張社會與民族進步的一派學說，而學說的自身也常在力求充實與進步，不甘一成不變，故步自封，所以他們認爲善意與富有建設性的評論，無論如何應當有它們的地位。信如我們這一番的解釋，可知社會科學範圍以內的大學教師，對於三民主義，不但無罪可言，且有微功足錄；而公展先生所暗示的責任問題，也是不適用的。

作者就公展先生這篇文章以及其它類似的報章稿件看，以爲三民主義目前已到達一個歧路的路口。一條路是宗教化，一條路是真正的思想化。許多服膺三民主義的人無疑的是希望它走第一條路，他們希望中山先生可以成爲教主，中山先生學說成爲一成不變，萬古不磨的經典，並且希望人人可以成爲信徒（公展先生文中即一再用到信仰與信徒等字樣），人人可以佈道。從這個立場，無疑的大學教師是十有九個不合格的了。公展先生所暗示的責任問題大概就在這裏了。不過，大學教師似乎根本不感覺到這樣一種責任；他們中間，有少數是已經入黨的，但入黨是一回事，宣傳主義往往又是一回事，好比西洋的基督教徒不必盡人要負起宣教的責任一樣；至於大多數未入

黨的目的更無從了解這種責任。不過這些未入黨的教師，按作者的觀察，對黨與主義却也不存甚麼成見，他們中間更有不少的人對主義抱着一個積極的希望，就是，希望它走第二條路，就是思想化。他們認為黨化是一條絕路，而思想化才是一條活路。三民主義的理論也許已經相當成熟，但總還不能說已經到一個十全十美無可增損的程度，中山先生是一位虛懷若谷的思想家，九原可作，自己一定也有這樣的一個觀感。既可增損，則此種增損的責任便應公諸國內以至於國外的一切有學術思想的人，而最責無旁貸，而作者以為也最樂於承受的人應該就是這一環大學的教師。不過就目前在歧路口的形勢論，這樣一個責任是幾乎不可思議的，中山先生的學說應該如何解釋，固難解釋，目前已有嚴格的限制，又何況增損呢？不過我們希望服膺三民主義的人要了解，這終究是一個孔子所說的「自盡」的政策；自盡是進展的反應。

有人說，宗教化的一條路對目前抗戰的局勢特別的有利。教師是領導青年的人，他們處的一個提綱挈領的地位，所以假若他們能掃數入黨，成為主義的信徒，則青年必風靡景從，而抗戰建國的聲譽必可以什伯倍的更加堅固。無疑的，公展先生的立場就是這樣的一個立場。不過這是無須的，而也是不一定有效的。愛國家，愛民族，擁護國民政府，支持抗戰建國的國策，時至今日，早已成爲全國人共通的意志，初不問一個人是不是黨員，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是誰都信得的，參政員中間有不少是國民黨以外的別黨別派與無黨無派的人；而參政會的歷史是和抗戰的歷史同時開

評定價格的原則

一、三個基本原則

在平衡物價時，平衡物價機關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對被統制的物品決定「適當的價格」。甚麼是一種物品的「適當價格」？甚麼是在決定「適當價格」時所應遵守的原則？

我們認爲在評定戰時適當物價時，應該循下列的三個原則：

第一，評定的價格應該符合於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在戰爭時期，有兩種消費者的利益應該特別顧及。一種是軍需物品的消費者，一種是日用必需品

給的。若說無黨籍與不信主義的人不至削弱抗戰的力量，則參政會便是一個最大的反證。目前直接間接參加抗戰工作的人中間，究竟有多少是黨員，多少是非黨員，我們沒有統計，怕誰也沒有統計過，但我們相信非黨員是要比黨員多得多。抗戰與入黨與否沒有不可須臾離的關係，好比做好人與信教與否沒有不可須臾離的關係一樣。這是無須的說法。目前反對抗戰與夫認賊作父的人中間，非黨員固然不少，黨員也不乏其人。汪精衛如何了？周佛海如何了？周佛海不還寫過一本「三民主義的理論的體系」麼？這是未必有效的說法。

先賢告訴我們：師克在和。又告訴我們，君子而不同。抗戰的目的是最後勝利，是克。克的條件在和，而不在分子的完全相同，真正有見識的人，雖不同無害於和，否則，雖同亦無補於和。目前整個的青年思想問題，以及對於這個問題教師所負的責任問題，以及這類問題對於抗戰建國的關係，我們誠能用這種眼光來看，當可省却無限的精力。

上文云云完全是作者個人的一些觀感。其立做教師的人是否有同樣的觀感，作者不敢斷定。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但記得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中國學生在紐約開追悼會，需用遺囑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英文本，當時遺囑是作者承乏翻譯的，宣言是作者和一位朋友合譯的，至今美國人所著關於中國書裏，間或還沿用着這些最早的譯本。作者追提到這一點，無非表示他對國民黨和黨義並無成見，以前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也因為沒有成見，才有興趣提出這樣一篇稿件來。

伍啓元

的消費者。前一種消費者是政府和軍隊，後一種消費者是一般的人民。在評定軍需物品的公定價格時，統制機關應該使它符合於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付力量；在評定日用必需物品的公定價格時，統制機關應該使它符合於人民的一般收入和購買能力。

第二，評定的價格應該使生產者和商人能够取得合理的收入和利潤，使生產者願意繼續生產，和使商人願意繼續經營。對於軍需物品，日用必需品，和出口物品，評定的價格並且應該能够鼓勵生產者增加生產。

第三，平衡物價機關在評定一種商品的價格時，應該使這種物價與其他商品的價格相調和。平衡物價機關應該一方面使農產品價格和工業品價格均衡，使原料價格和製成品價格均衡，而另一方面使統制物的價格與不被統制的物的價格維持均衡。

二，最高價格

爲着要使消費者能繼續購買和消費一種物品，平衡物價機關可以對那種物品規定「最高價格」，使消費者在購買這些物品時不用支付這個「最高價格」以上的代價。

這個最高價格可以是「一致的」，但也可以是「不一致的」。所謂一致的最高價格是指不分地域，不分季節，不分購買者，而全國一律的或相同的最高價格。對於生活上所絕不可缺少的幾種必需品，我們認爲政府應該設法維持一致的最高價格。這種辦法雖然會增加統制機關的工作並且有時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但因此能使各地的消費者得到相同的待遇，所以也是一種良好的辦法。此外政府在徵用軍需物品時，通常所定的「徵發價格」大都是一種「國一律的價格」。

但大部份的最高價格是「不一致的」，是因地域，季節，和購買者的不同而不同的。(一)通常在不同的地方，同一種物品的公定最高價格會發生很大的差別。在消費地的最高價格，會較在生產地的最高價格爲低；在離生產地較遠的消費地的最高價格，又會較離生產地較近的最高價格爲低。在現在中國情形之下，因爲戰區和非戰區情形不同，所以在戰區內最高價格，也可以與在非戰區內最高價格不同。(二)通常在不同的季節中，若干物品的價格會發生季節性的變動。因爲這種原因，統制機關也可以讓公定的最高價格依照其自然的趨向作一種季節性的變動。(三)就是在同一地區和同一季節中，一種物品也可以有一個以上的公定最高價格。例如政府對「徵發價格」可以較一般消費者的最高價格爲低。又如對於糧食或其他物品的購買，統制機關可以依照購買者經濟能力的差異而給以不同的待遇。消費者的收入較多的人，統制機關可以令他們出較高的價錢；消費者的購買能力較小的人，統制機關可以允許他們出較低的價格。

在上述的三種情形中，第一和第二種是比較普遍的，而第三種是比較例外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通常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中，最高價格是一致的。

無論最高的價格是一致的或不是一致的，統制機關在決定最高價格時，主要應該根據消費者的收入情形。換句話說，消費者的收入愈大則消費者購買能力愈大，最高價格可以定得愈高。在最高價格決定以後，除了因消費者的收入發生變動外，不應隨意加以變更。倘使消費者的收入發生增減，則最高價格也可以隨之而增減。

三，最低價格

爲着要使生產者願意繼續生產一種物品和使商人願意繼續經營一種物品，平衡物價機關可以對那種物品規定「最低價格」，使生產者或商人在出售這些物品時至少可以得到這「最低價格」所保證的收入。

這個最低價格可以是「一致的」但也可以是「不一致的」。無論最低價格是一致的或不是一致的，通常統制機關決定最低價格，應該以「成本」爲主要的根據。具體地說，最低價格應該等於成本加上相當的利潤。根據我國政府所頒佈的評定物價法規，在規定公定價格時，主要也是以「成本再加相當之利潤爲標準」。但用「成本」來做評價的標準也不是沒有困難的。首先，計算一種物品的成本，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西洋的國家，成本會計已經相當發達，調查一種物品的準確成本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國會計不發達的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但我們也不能像有些作者所說，物品的實在成本是無法估計的。我們以爲對於新式的生產事業，我們可以利用成本會計所給予我們的技術，來計算比較精確的成本。至於不能採用成本會計的生產事業，我們可以先計算每一單位產品所需用的原料和勞動的成本，然後再增加一個估計的數目，來代替其他一般費用。用這種估計的方法是比較簡易的；因爲原料的價格是容易調查的，勞動者的工資是容易知道的，而其他一般費用也可以根據已往的數目而加以約略的估計。這種估計雖然不很精確，但也可以做規定最低價格的根據。倘使這種估計也不可能，統制機關也可以利用以往數年的平均價格和平均利潤來推算出以往的成本，而再按照最近變遷的情形來估計最近的成本。例如一種物品在以往數年中的平均價格是每單位一百元，而在那幾年中它的生產者的平均利潤是百分之二十，則它在已往幾年中的平均成本可以估計每單位八十元。假定最近這種物品的生產成本約較已往增加百分之十，則這種物品在現在的成本可以估計爲每單位八十八元。

即使我們能够根據上面所提出的方法來估計一個生產者的生產成本，我

們也不容易立即決定甚麼是適當的「最低價格」。因為成本本身是不一致的。

• 第一，成本本身是會常常變動的，而最低價格是不應該常常變動的。因此倘使統制機關根據現在的成本來規定「最低價格」，則統制機關一方面應該設法保障原料價格、工資、地租和其他原費的穩定，使它們不往上升，增加，而另一方面應保證公定價格不會往下跌落。否則成本增加了或官價下降了都會使生產者遭受損失，因而對生產會發生不利的影響。有時統制機關會不明白規定最低價格的數目，而只籠統地擔保生產者能夠取得他底實在的原費或成本。第二，在任何物品的生產中，各生產者的成本狀況大抵是不相同的。那麼在規定「最低價格」時，統制機關究竟應該根據最高的成本呢？最低的成本呢？還是平均的成本呢？倘使根據最低的成本（即生產效率最高的生產者的成本）來規定最低價格，則效率較差的生產者便無法繼續生產，因此會引來生產減少之現象。倘使根據最高的成本（即生產效率最低的生產者的成本）來規定最低價格，則雖然可以維持所有生產者使他們繼續生產，但無法鼓勵生產效能的改進，也是一種缺點。倘使根據平均成本來規定最低價格，則成本在平均成本以上的生產者也會無法繼續生產，生產也會減少。因此在規定最低價格時，是很不容易找出一種適用的成本來做標準的。我們的意見，以為最好能夠選擇可以代表大多數生產者的成本來做決定最低價格的標準。通常大多數生產者的成本都是相去不遠的，因此用這些大多數生產者的成本來做評價的標準，可以使大部份的生產者都能夠繼續生產。至於少數生產者成本較高的生產者，如政府感覺到使它們繼續存在的必要，則政府可以用津貼的方法，補助它們，使它們照舊生產。

有時因為生產成本的不同，統制機關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中，也會採取不一致的評價辦法。例如統制機關對於同一物品的生產者，可以因他們生產狀況和成本高下的不同，分為若干種類，對每類規定一個最低價格。又如，在若干場合之下，統制機關可以採取一個別評價的辦法。統制機關保證每一個生產者都能夠得到合理的價格，因此每一個生產者的售價，都應按照他底個別的生產情形和成本狀況來單獨決定。我們認為這種「分類評價」或「個別評價」的辦法都是不甚妥善的辦法。一方面這種辦法增加了估計成本的工作和費用，而另一方面對同一種物品竟有許多不同的官價，必然地會引起許多的不便。因此除了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們認為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中，

對每一種物品應該只有一個最低價格。

上面說明了成本在評定最低價格時所佔的地位。但除了成本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合理的利潤。適當的最低價格，應該等於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潤。因此在決定最低價格以前，統制機關應先評定「合理的利潤」。評定利潤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辦法，一是以過去若干年間的平均利潤來做合理的利潤，一是根據當時一般經濟情形來決定的平均利潤。

計算「合理的利潤」時，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標準。一是按照資本的數目投資的數目來計算利潤與資本（或投資）的比率，一是按照出售數量來計算利潤與出售數值的比率。大抵前者適合於評定生產者的價格，而後者適合於評定商人的價格。

在評定公定價格時，我們認為應該分別生產者的合理價格，零售商的合理價格，和零售商的合理價格。生產者的合理價格，應該等於生產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潤。我們認為在中國現行情形之下，生產者的合理利潤，可以因投資情形不同，分別規定每年不得超過資本額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零售商的合理價格，應該等於生產者的售價加上零售商的合理利潤，我們以為可以依照「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辦法」的規定，定為成本百分之五。零售商的合理價格，應該等於批發價格加上零售商的合理利潤，我們以為可以依照「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辦法」的規定，定為批發成本百分之二十。

四、價格的均衡

統制機關不只要為消費者規定最高價格和為生產者規定最低價格，並且應該維持價格間的均衡。

首先，統制機關應該使消費者的購買價格與生產者的出售價格維持均衡的關係。在自由競爭的假定下，消費者的購買價格應該與生產者的出售價格相等。在物價統制的場合下，我們認為在可能範圍之內，統制機關也應該設法使這二者相等。因此為消費者規定的最高價格，應該等於生產者規定的最低價格。通常物價統制機關所評定的「官價」，就同時是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格。

在通常情形之下，官價不會完全符合於消費者和生產者雙方的要求，但統制機關可以用統制需要和統制供給的辦法來使「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

「相等。政府並且可以直接用財政的方式，使這兩個價格一致。倘使適合於消費者的最高價格是較適合於生產者的最低價格為高，則政府可以用租稅的方式減低消費者的購買能力，使「最高價格」降至與「最低價格」相等。倘使適合於消費者的最高價格是較適合於生產者的最低價格為低，則政治可以津貼生產者的方式減低生產者的成本，使「最低價格」降至與「最高價格」相等。用這些辦法我們可以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中，對一種物品通常只有一個官價——一個同時適合於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官價。

統制機關不只應該維持一種物品的官價之本身的均衡，它並且應該特別維持這種商品價格與他種價格間的均衡。倘使這種物品是一種工業製成品，

患土地饑餓症者

一、有錢人買田是未計

念過賽珍珠所寫那本「大地」的人，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中國農民真是視土如命的。他們好像是患着永遠不會吃飽的土地饑餓症。是的，農村中有多少人在做着擁有土地的夢想；可是，若說土地本身具有特殊的魔力，會顛倒一切農民，則又言之過甚了。土地能吸引人的究竟不過是它的經濟價值。土地的經濟價值是有限的，在這限度之外，它就沒有魔力了。因之，它時常不能顛倒農村中有錢的人。他們並沒有亟亟要買田的衝動。他們買田常是無可奈何時的末計。

有錢的人不亟亟於買田是因為農田的利潤比了放債的利息為低。有錢買田不如放債。我在蘇村調查時，曾計算過經營農田的利潤。二十七年時，一個僱工經營農田的地主，在一工上等田上，可以得到六元國幣的利潤；而這工田當時值價國幣八十元，加上經營時所需流動資本約四元，他經營一年所得利潤不到一分。若是他把田租給人種，每年收租穀收百分之六十約六斗，當時值四元八角，所得利潤更少。農田的利潤在一分左右是蘇村農民所承認的，我在路南調查時，村裏人也是這樣說。

放債的利息多少呢？二十七年時普通都是用幾息計算的，借十元國幣，每年借息四斗穀子，值價三元二角，合年利三分二，以三分二的放債利息和一身上下兩田利比較，相差得很顯明。一借錢來種田，愈覺愈窮——資

則統制機關在決定它底價格時同時應該顧及它底原料（或半製品）的價格，勞動者的工資，土地的租金，資金的利息，和其他構成它底價格的要素的價格。必要使它底價格能夠與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能夠調和，然後物價統制才能有效。

在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中，勞動者的工資最為重要。關於評定適當工資的原則，我們以為大體上與評定其他官價相同。一方面公定的工資應該符合於工資雇用者的情況，一方面公定的工資應該符合於勞動的生活情形；而特別應該注重於後者。換句話說，勞動者的價格至少應該等於勞動的「成本」，而勞動的成本可以根據生活費指數和家庭預算來加以決定。

費孝通

本是向着利息高的路上走，有錢人願意放債，不願意買田。

也許有人會發生疑問：農村中既以經營農田為主要生產事業，這主要生產事業祇有一分利潤，借款利息如何能提高到三分以上呢？這疑問是發生得有道理的。在現代工業金融中，借款的利息不能超過一般的工業利潤，因為若是超過了，就沒有有人願意投資在這項工業上去了，可是在農村中，借款根本很少是用來作生產資本的。農民們祇在生活不能維持時，才要借錢。他們是為消費而舉債。為消費而舉的債，利息的高低是以需款的急迫程度來決定的，三分二的借款在農村中是最客氣也沒有的了。

借錢給人消費，這筆借款不能收回，就沒有多大保障。雖則農民重情，要面子，個人人格担保的力量也許比城裏人靠得住些，可是所借的錢既不用在生產事業上，很可能到應回款的時候，心有餘而力不足，拿不出錢來。債主要預防這一着，不能不要債戶把田契交出抵押，用農田來抵押並不是說借款的用途限於作農田資本，而且債主預防債戶回不出款，到沒有辦法時，還可以把債戶的田出賣。有錢的人目的在放債，放債的結果却常常會到非收買農田不可的境地。這是放債者的末計，因為從此他將接受一分左右的利潤而喪失三分利息的機會了。

二、土地是勞工的保障

農田不是個最有利的投資對象，所以有資本的人對它並不發生太大興趣

；可是農田却是個吸收勞力的地方，有土地，工作的機會就得到了保障。農民們有勞力尋求利用的機會，在工業沒有發展的地方，除了土地之外很少有可以利用勞力的事業，勞力不比資本，資本可以儲藏起來，等有利的時候再使用，勞力却儲藏不起的。一天沒有工作做，人還是要吃飯，不做工，熱力一樣的消耗。在這需要以勞力來換飯吃的人才患着土地饑餓症的人。

有能力買田的，並不亟亟於想買田；想買田却沒有能力買田，這是農村經濟中的一個矛盾。一個靠勞力來求生活的人，要積蓄到能買田的資本，差不多是不很可能的，二十七年工資是：男工一天一角國幣，女工減半；二十八年十月，男工漲到三角一天，女工減半（做工那天膳食都由僱主供給）。若用當時的米價來折合：二十七年男工每天得米一。四公升，二十八年十月每天得米一。七公升，女工減半。一年農作期約二百天，若是一個男子在這期內，天天有工做，可以得米約三公石，可是農閒期，他要自己開膳食，每天兩餐至少需米〇。六公升，一百六十五天共需米約一公石，因之，他約有三分之二的收入可以用來買菜下飯，買酒自酌，添補些衣服，進進茶館。至於他能有多少儲蓄則很難說了。我在蘇村認識一個單身賣工的男子，十多年來積蓄了七八十元，七八十元的儲蓄不買一工上等田。而且這輩單身男子有了一些儲蓄，第一要事還不是在買田，而是娶老婆。一有家眷，情形就不同，賣工作來的錢能多開銷已經算是好的了。積蓄買田實在太不容易了。

上節裏所計算賣工者的收入是假定他在農作時期天天做工，沒有一失業的時候，事實上，即使不說個人的病痛或是天災人禍，就是在太平時代，這也是不太有把握的事。要自由支配勞作，以充分利用自有的勞力却不是個被動的工所能希望的，在工業社會中，自從勞工和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分了家之後，失業問題總是無法解決；在農村社會中沒有土地的勞工，也是永遠說不了零星失業和贖費勞力的威脅。他們爲了要保障工作的機會，土地也就成了他們急善的東西。

三。土地的封鎖

在村子裏沒有田，靠賣工度日的人，很多是從別地方徙入的「新戶」。以蘇村說，三十八家沒有田的人家中，有十九家是「新戶」。所有的新戶中，還沒有一家得與土地所有權，祇有一家買得了十工田，有十一家連租田都弄不

到，有八家是佃戶。

我在江村也見過相似的情形，外鄉人不能經營本村的農田。這種土地封鎖也許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凡是在一種以家庭或個人爲單位的移民，進入一人口已很稠密的地方，土地已經被該地人民佔有的時候，外來者常是祇能接受佃戶和傭工的地位。我在廣西象縣縣山中曾見過這種現象最清楚的表示：

「在大藤峯山中的諸族團，入山的時間有先後的，先入山的佔據了這區域，成了這峯山的地主；後入山的，因爲該地已經被人占據，又沒有力量來分割，於是成了租地生活的佃戶，我們不知道峯山的詳細歷史，尤其關於諸族團移殖時的情形，但是依據現在漢人個別入山租田的情形，使我們猜想這現在峯山中作佃戶的諸族團，當它們移入時，是出於很少的單位，所以他們不能和已有組織的地主族團爭峯山的地權。」（花藍峯社會組織，四五頁）

土地封鎖有疏嚴之別，有峯山中除了地主階級的長毛峯之外，任何人不准在峯山中有地。他們是不惜以武力來對付佔占的人，我在山裏時候，正逢着峯山爭地的一個案子。所爭地的村落，房子都燒了，祇剩一個老太婆在破屋中住着。江村土地權已大量的流出村外，可是他們却保持着永佃權，而且排斥外村人經營本村農田。排斥的方法各地不同。我聽說雲南有個村子，並不禁外村人來買田，可是買主若想到村裏來耕種時，他得帶着種種麻煩。其中之一是不給外村得到水利的自由。要他出大的價錢來買水。這樣使地主覺得不值得自由經營，不如把所有田租給當地人去經營就算了。

在蘇村，不但外村不容易買田，連外姓都不容易，他們的規則是農田在可能範圍之內，不准流出宗親團體的。凡是有人需要錢不能不出賣農田時，應當先和同族的人商量，有沒有人願意收買。若是合族人不買時，他才可以賣給族外的人。我們知道有姓劉的，有個小兄弟要賣田，而且已經說好了一個買主；後來給他的哥哥知道了，提出異議；這項交易至今擱置，沒有成交。買主得不到賣者同族的簽字，契約是不能成立的。農田買賣並沒有自由市場。一層一層的封鎖線，使外村來的新戶極不易得到買田的機會。

四。上門的姑爺

一個外來的單身賣工的男子，想得到農田最簡捷的辦法就是上門。上門

是入贅的意思。入贅是我國農村中常見的事，可是在很多地方，這是祇發生在沒有兒子的人家。可是在蘇村（其他雲南農村很多和蘇村相同的）有兒子的人家也有爲女兒招姑爺的。招婿的女兒和她的兄弟一般都有繼承農田的權利。因之，上門的姑爺託他太太的福，也有了農田了，而且他若是帶有錢來，或是積得相當的錢，要在本村買田就不受上述封鎖的限制了。

上門的姑爺其實祇靠他太太的田產獲得生活的保障罷了，他並不是農田的主人，太太死了，他家裏人可以把他田產收回去。甚至他的兒子也不一定能享母系的財產，依蘇村的習慣上門姑爺的兒子可以分姓父母兩姓。姓父的沒有資格繼承母系財產。姓母的有繼承的可能。若是母親的兄弟輩心眼兇狠

生活

天黑刮風。

風從南邊吹來，翻着房頂上的瓦片亂亂響；樹叢間時時飄揚起一掃紙屑塵粒，看去像在模糊的夏天黃昏，屋簷口混着清涼的幾隻蝙蝠；一羣蚊子。幾盞路燈亮得有氣沒力，——照射着兩排烏黃的鋪房板壁，將這條破舊的街頭，顯得更爲破敗。

街頭巷尾全冷落得怕人。時或有二三稀稀傢伙，從兩頭轉角處溜進來，脚步踉蹌，互相嘟囔着一串難於被旁人了解的話。走到某個屋前或巷口，停下來，提起一隻褲管，毫不介意的當槽沖一泡尿，然後舉手在一扇陳朽的板門上敲擊，門扇即應聲移開一個縫，把人吞了進去。

一個屋門裏，有個瘦女人從黃昏時候站到深夜。她不時從腰門邊探出頭來，向街巷兩端張望。這女人容顏憔悴，臉龐上厚厚擦抹着一層賤價脂粉。風從屋簷下掠過，把她的一束枯黃頭髮吹亂了。她打了個冷慄，從袖管裏抽出雙手，蒙住嘴咳嗽；把另一隻附在胸口上，吐出兩口濃痰。

從街巷北邊，迎風走來一個賣笛子的，左肩上掛着兩串長短竹笛，吹着一支。手擺着笛孔，吐出各種不同音節，合成一首生動的曲子。

吹笛人偏着頭，兩片嘴唇搭在一個笛孔上，六個指尖起落自如。脚步拉動得慢吞吞的。

「討厭鬼！你走快些不好？」那女人還站在屋門口。她望着吹笛人翻個白眼，吐着生氣的說。

，等母親死了，田產也可以被收回去的。在這時候，得不到田產的孩子，可以恢復父姓，可是上門姑爺自己買來的田產，他太太的家裏人却不能顧問了。上門姑爺在社會上地位較低，連他的兒子們都不易做村子的領袖，他願意接受這地位的原因，（那些姑爺自己也承認的）是爲了要得到農田。蘇村所有上門的姑爺，其中祇有一個是本村的，其他全是外村來的，外村人靠了這種婚姻關係，進入本村社區，獲得了妻子的田產，而且有了收買本村農田的權利。爲了這經濟利益，他們就是給別人看不起一些也是值得的。可是，在我們局外人看來，那輩患土地饑餓症者，要用這種方法來穿破土地封鎖線，也是怪可憐的了。

木楓

吹笛人輕輕的說「臭婊子！」走到街盡頭處，轉過轉角消失了。笛聲依然被風傳送過來。

女人輕輕嘆息一聲，低下頭，用牙齒咬着一個指甲。風順屋簷下掠過，又吹亂了她一束枯黃的頭髮，披散在瘦小的臉頰上。

那女人呆了，心裏想着一件往事，——實在陳舊而且平凡，但是它偏偏還咬住她的心子。

八年前住蘇村，她在一個「老爺」家作傭工，老爺是讀書人，在衙門做科員。一個夜晚，光景也如同這個夜裏一樣。太太打牌去了，男主人說歡喜她，簡直害了一相病——把她帶到柴房裏，去做了許多新鮮事情，事後在她手心塞給二十塊銀洋，把一張毛胡胡的嘴巴湊近她的耳根說，「真亂說話！收下這點錢，到別處做事去罷！我本來捨不得放你走，只因那母夜叉又妬又兇，容不下你，知道了會殺死你。」她聽呆了片刻，停停就哭了。她想：「你是不是不要我了？」男人生了氣，「你不怕死嗎？」教她趁早走路。她才止住了哭，恨恨的說，「你是一個沒良心的人！」可是她實在怕太太真的會害死她，就挾上幾件舊衣服，流着熱淚，迎着寒風，離去了主人的家屋。當晚無去處，只好到附近鐘樓下，一個人呆坐了一整夜，起過跳河尋死的念頭。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東方發白，望着太陽出了山。心中轉了念頭：「被狗咬了一口」，祇裏住不下去，打定主意投奔到省裏去，到了這制地方以後，先是做女傭，混過不少日子，手脚笨，事做不好。換了好幾處地方，還是

受主人家的嫌氣。加之自己性格也好像愛發怒，年紀又青，不可免被同伴女人拜訪姊妹，帶她看了許多城裏事，城裏一切壞風俗看顧眼後，結果就被環境和性格帶上錯路。有一次主人家一個車夫又說爲她害了「相思病」，做夢事被主人知道，開除了，那車夫帶她出來，把她抵押了八十塊錢，拿了錢溜走了。她於是作了一「半開門」。她在城市上已經活下來八個年頭，精神兩體飽受折騰。這份生活已够受了。可是你够「命」不够，八十元押賬一輩子也還不清。她在這眼，她心想，「這是前世欠下來的。這還够了本，就死了。所以挨打，她忍受，害病，她忍受。月經中用明礬水洗，好照樣接客，一切痛苦自然，不知痛苦更不知羞恥。

女人數數過去，心裏想道。她想起第一個老爺，抵押她的車夫，覺得男 都少良心。但是沒有男人，就活不了！她現在等待的不是「男人」？人在痛心時候，新舊失意事就像幾粒珠子，被一根回憶的線連貫着穿在一起。

市面不好，什麼生意都不好，也影響到這方面。她已有兩天得不到主顧上門。今天吹笛人未來以前，會有一個長衫子客人打這條街走過身，對她腰門裏很有意思的望著。那女人見了，像一隻冬天的狼，在荒涼山野中發現一匹鹿子，不輕易放走他。跑出來一拉住那經過路人，說：「先生，玩姑娘嗎？你到家坐坐，我陪你玩玩好不好。」長衫衣住胸，看了一看，乾着嘴，不吐吃，裝作正經人神氣，甩甩手，敲着腰，吐給女人滿臉皮碎唾沫，「呸！臭婊子，不識羞恥，這時候也拉人，我要叫警察來抓你送感化院。還不服老子滾！」一掌把她推到街溝邊，挺着胸脯走了。她當時並不傷心，只恨那「臭婊子」的背影，心想，「你罵我臭婊子，你們男子都是香的！都有良心！」

女人反復嚼着兩句話，「婊子是臭的，你男人都是香的。」繼續等待下去。又唱了會「四季相思」，也唱不下去。可是又等了一會，她覺得身體實在很疲倦，有點招架不來了。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氣，揉揉眼睛，模糊地望望街巷兩頭，轉過身去推開門，走進屋子裏面去了。

風吹着電線發着尖細響聲。

「嗚……嗚……嗚……」

更覺將夜序拖向更深的段落去。

疲倦常常會有一種更密切於實生活的慾求逼走。過了一會，那女人又拉開門探身出來，吸着「枝美牌香煙」，仍然站在屋門口。她不能不等待，也許會碰到個夜游浪子，懷着半醉心，帶了些錢，來買笑尋歡。一陣風吹襲在她身上，她微微顫抖着。把小半截煙蒂擱在地下，賭想了，又用手掌心蓋住嘴噴嚏不止。

「難道香男人都死絕了不成？……男人都是香的。今夜格外香。」街尾轉角處走來幾條人影，還隱隱聽得他們說話的聲音。她盯住他們，如一隻鷹鷂盯視着一羣雞雛。

待那幾條人影走得近了，才看個清楚，原來是幾位襤褸的隣居。

「四姐！深更半夜，你還站在門外邊不冷？等那個男子，安心去睡罷。」那幾個人當中的一個說。

「做樣子，等老子，老子不來吃餃子，……」她隨口答應着，咕咕笑着，因爲遠處正有賣餃子的竹片子響着。

幾個人擁進一間破敗的大板屋中去了。那女人依然站在屋口，將身子靠貼門柱，睜開兩隻酸澀的眼睛，望望幾盞黃慘慘的路燈；燈光下的塵粒，在風中打着旋。

「答答叨，……答答叨……」一根小蠟棍敲着一塊厚竹片的響聲。那女人靜靜的聽着，想辨認出這個響聲會不會走進這條街巷來，她移動脚步，站到街溝邊去。

她看見街頭亮着一盞紅燈籠。紅燈籠隨風飄動着，近了！那小生意人挑兩隻高木箱，扁担頭掛住個紅燈籠，小蠟棍和厚竹片子捏在手上，邊走，邊敲，招邀主顧。

在小巷口停止了放下担子。吹過風，一隻木箱口吐出一串紅火星。女人走到木箱旁來站着。

「要吃麵吃餃子？」

「吃一碗飯，後來麵，多放辣椒醬油。」

那男人從湯鍋裏撈起兩份麵食，放好各色香料，（黑呀呀多加辣椒醬油）遞給她。

女人捧着手吃着，邊問那男人問長問短：

「大哥！你有家小嗎？」

「沒有，這年頭！自個兒也保不了，要養活老婆娃娃們容易？……」他說着，把手掌在圍腰布上揩擦，心裏想「幹甚麼來盤問我這些事，你要找個漢子不成？」

又吹過一陣風，一串火星子打木箱口噴出。那男子扯扯他頭上戴着的那頂破舊的黑呢帽。

「還要不要？」男問她。

女人搖搖頭。從衣袋內掏出一條手帕來，揩揩嘴，擱了擱眉頭，說：「大哥，我忘了帶錢，你等着，回頭拿來開你。」話不說完，她轉身就想走。

「喂喂，不成的！天曉得你的家在那？身上不帶錢來吃東西？你不能走。」

「那男人看女的面色不好，搶前攔住她。」

「不是你就明天來取，何必這樣認真，錢少不了你三碗錢錢。」她閃過一邊邊想趁空溜開。

「不成！小生意，親娘舅也要現錢。你就地歸滑給我。」那男人一把抓住了她的衣襟。

「不放心你跟我去拿，好稀奇豆八個錢！」她扭扭身子，色情地望著那男人嬉笑了一個，強拉着他走。

「稀奇不稀奇開了完事。」男的說。

兩條人影倒射在街面上溜過，前一條粗大的伴着後一條弱小的。

「大哥！你這樣大年紀沒有家小，身子不困疼？今晚我陪你鬆鬆腰，舒服舒服，那些不好？」她柔聲的說着，拉起那男人的一隻手來，把它按折在自已的乳房上。

那男人不做聲，心中打量着。「你個狐狸精。原來如此。」

一女人影子閃進那開舖房裏面去了。街心裏，只留下一盞紅燈籠，守住一個熱食担子。

不久之後，那男人走出來。女的追在後面說：

「大哥！你得給我點錢。」

「還要給錢！……你白吃，我的飯麵，我得着你一次……，不是圖賺這？」男的回頭說。

你三碗飯麵賣幾文？值不得胭脂水粉錢，我平常陪旁人打個乾茶團，也要五六塊。」女人緊緊追在後面，拉着他。

「真倒霉，見鬼！生拉活扯弄你釣上了，……」他埋怨着說。從懷裏摸出幾張零票子，扔給她。順手在她的屁股上重重擰了一把。

女人接過錢。也就不再為數目的多寡作爭論，還放低聲音啾啾和和的說：

「明晚上再來，我等你。」

「天天來供應你上下兩張嘴，我做狗在地下爬？不幹！」

那男人氣狠狠的說着，挑起麵食担子走了；把小鐵棍和厚竹片拿上手敲着：

「答答叨，……答答叨，……」

一盞紅燈籠飄搖在扁担頭；一串火星子隨風向往飛。

本期撰者

本期作者幾乎都是讀者所熟識的。「今後的外交」一文是錢端升先生近撰關於中國當前問題數篇之一。潘光旦先生討論教師的思想問題，是根據多年教學的經驗和心得。我們希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參加討論。

伍啓元與費孝通二先生均在撰寫有系統的多篇文章，嗣後仍當繼續刊登。

本刊

第三卷 第十八期

時評三則
在朝與在野
今日的財政與經濟
改善戰區行政的幾個建議
如何組織及管理蔗糖工廠
石庭之夜

王毅
錢端升
谷宗瀛
沈子思
孫清

五月五日

本刊

第三卷 第十七期

時評三則
歐戰的推演與中國的地位
論民主國家統制私產的辦法
關於種族名詞及民族政策
土地繼承和農場的分碎
戰時運輸的統制
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

錢端升
李樹清
胡體乾
費孝通
符澤初
姚芳

四月二十八日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雲街一號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零售壹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